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博览会

□ 洪振强

近代意义的博览会，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起源于18世纪晚期的西欧，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从历史上看，博览会经历了限于一国到世界各国参与、内涵日益丰富的发展历程。博览会尤其是世界博览会，不仅促进了主办国的进步发展，还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带来了重要影响。

从一国发展为世界各国参与。近代博览会最早发端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和法国。一种说法是始于1761年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在伦敦举办的为期七周的“艺术、制造和商业”展览会。但1798年由拿破仑发起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首届工艺博览会，是较为公认的“博览会之滥觞”。此后半个世纪里，法国又举办了10次类似的博览会，平均5年一次。这些限于一国的博览会，对推动英、法等国的工业革命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博览会从一国发展为世界各国参与的世界博览会或国际博览会（亦统称万国博览会），始于英国。1851年，由维多利亚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主导，英国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了“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为期近6个月，共有约10万件展品，10个国家参展，约630万人次参观，并使用4500吨钢材、30万块玻璃建造了举世瞩目的“水晶宫”作为主会场。如此规模空前的盛会，极大促进了当时以钢铁为代表的世界科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巩固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之后，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竞相举办万国博览会，以促进本国发展，宣示本国的强盛。

20世纪初，各国纷纷举办博览会导致其日渐泛滥。于是，法国牵头商讨规范发展博览会，1928年各国正式在巴黎签署《国际展览公约》，成立了国际展览局。此后，举办世博会的国家须加入国际展览局成为其会员，并要向其申办，获得其注册、认可。时至今日，国际展览局已有180多个成员国，1993年，中国正式加入成为其第46个成员国。

日益丰富的内涵带来日渐深远的影响。美国对世博会尤为热衷，也是

世博会举办次数最多的国家。美国举办的世博会同时具有庆典的目的和意义，把博览会从展示之会发展为庆典盛会。开其端者是1876年费城世博会，旨在纪念美国在费城发表《独立宣言》正式建国100周年。如此一来，世博会从工业、科技、经贸、艺术的展示盛会，逐渐发展成为集庆典、会议、运动、娱乐、美食等包罗万象的欢乐盛会，被誉为“经济、科技、文化领域的奥林匹克盛会”，体现出娱乐性、大众化，更为贴近“人”和“人的生活”。世博会在美国走向富强繁盛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国际展览公约》签署后举办的第一个世博会是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旨在纪念芝加哥建城100周年，因此以“一个世纪的进步”作为此届世博会的“主题”。这是世博会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使用“主题”，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此，世界博览会的展示精神从“物质”升华到“理念”，从注重“产品与技术”的创新提升到“理念与文化”的更新迭代，从注重物质技术的进步到更为关注人类的命运前途。此后，历届世博会基本围绕人类可持续发展设计相关主题，涉及人与自然、人与技术、能源、水源、太空、海洋、生态环境、城市、健康生命等诸多方面。

博览会给人类带来了深远影响，它不仅促进了举办国发展进步、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而且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与人类文明演化进程息息相关。迄今为止，与人类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革命、汽车革命、通信革命、信息革命、环保革命等等，都与博览会或多或少有着关联。人类生活中的蒸汽机、火车、电报、电话、电灯、电影、汽车、飞机、电视机、传真机、原子能、空调、计算机、手机、机器人等各种新发明，很多是通过博览会的展示而传播开来。通过博览会的展示比较、品评研究、评比授奖，这些展品所代表的科技可以获得进一步创新进步的动力。而且，世博会所主张的“主题”理念，实际上是在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美好，从而推动人类

文明走向更高阶段。特别要提及的是，博览会还有力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其发展演进与全球化进程紧密结合。博览会从一地一国发展到世界各国参与的万国博览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汇聚一堂，宛如“地球村”。同时，博览会亦从欧美向世界其他地区拓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参与、举办博览会，比如日本和中国，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强。

博览会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博览会在晚清时统称为“赛会”，参加博览会就是赴赛。清政府一直对赴赛不甚积极，只是委托由洋人把持的总税务司署（海关）代办赴赛事宜，长达30余年，直至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清政府才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赴赛。1905年，清政府又正式收回赴赛主办权，归商部主理。此后至1911年灭亡，清政府赴赛达10余次。民国时期，囿于战乱和财力限制，中国政府赴赛次数寥寥无几。不过，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对参加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非常尽力，希望借此敦睦中美友谊、振兴工商业经济。此次赴赛取得空前成功，获得奖章1211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没有参加西方所主导的世界博览会，直到1982年才首次参加美国诺克斯维尔世博会，此后，中国成为世博会的常客。

而近代以来，中国也逐渐认识到举办博览会的重要性。自19世纪80年代起，晚清社会在认识到博览会具有兴发商利、启智劝业等作用后，就开始呼吁在上海、汉口、南京等地举办博览会，“浚利源而阜国计”。但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实施“新政”，决心振兴农工商业，才督导各地效法日本，举办各种劝业会，以劝兴实业。其中，最典型的是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这是近代中国首次具有全国规模的博览会，会期177天，共有100多万件展品，约30多万人次参观。这些劝业会，都围绕着“产品”转，不仅展销产品，而且对展品进行审查评奖，指导、激励产品改良进步，推动了实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有利于晚清经济和科技的现代化。民国时期，“劝业会”逐渐演变为“国货

展览会”，即以展销“国货”物产为主的博览会，比如1915、1947年的全国国货展览会。这些博览会通过宣传、展示、品评、销售、改良国货，推动国货精进，在谋求国货发展的过程中，也促进了实业知识和科技的传播与进步，推动了国货的改良与制造，进而促进以国货为表征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促进城乡物质交流，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举办了大量有关物产交流交易、经济建设类的展览会，最典型者是创办于1957年、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这些展览会具有如博览会一样的经济功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动了新中国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各行业纷纷办起各种各样的展销会，对搞活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展销会不断规范发展，大多开始称之为“博览会”，且不断创新、与时俱进，至今呈现出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趋势，甚至形成了独立的会展业。这些博览会基本由政府肇画、主导，而且主题鲜明，既有地方性的品牌博览会，比如深圳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高交会”），又有央地合作打造的主题性博览会如“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还有国际合作举办的区域性博览会如“中国—东盟博览会”，等等。此外，中国还成功举办了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和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等级别较高的世博会。这些博览会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直接拉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又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平台和动能，有力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考狄：从多领域推动法国汉学繁荣发展

□ 谢泽颖

长期以来，法国学者在海外汉学研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诸多声名赫赫的法国汉学家中，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年）是较为特殊的一位。考狄不仅是汉学大师沙畹、马伯乐等人的引路人，还编撰了享誉中外学界的西方汉学目录学奠基之作《西人论中国书目》，创办了有100多年历史的权威汉学期刊《通报》，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汉学推广等多个领域，为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空前繁荣乃至推动西方汉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19世纪下半期，中国政治、社会形势发生巨大变革，成为外商眼中的重要市场。1869年，在经商的父亲的劝说下，20岁的考狄放弃了在法国文献学院的就读机会，前往上海的美商旗昌洋行供职，以便熟悉中国商业、社会环境。然而在沪期间，相较于频频出席各类社交场合，更令考狄感兴趣的是在业余时间从事图书的整理工作。1871年，考狄接受了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荣誉馆员职位，次年便为该馆编写了第一部完整的馆藏书目，为当时在华从事亚洲研究的外国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利用工作之便，考狄几乎走遍了各大口岸城市，自称有“藏书癖”的他，购买收藏了大量的中国珍本古籍。可惜的是，这些书籍在被运回法国的途中因轮船遇险尽数沉入海底，成为考狄终生的遗憾。虽然未能接受专业的学术训练，但是在华期间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仍为考狄日后继续从事文献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时代的巨变之下，为谋求自强，清政府在1877年派遣首批政留

学生赴欧洲学习。考狄应时任福州船政局正监督日意格之邀充任学团秘书，此后约4年间，他随中国学团遍访欧洲，为中国学生的生活、学习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这项工作在1881年结束，但考狄与学团人员的友好关系却得以延续。据学者研究，1897年，考狄在巴黎热情接待了曾经的学团成员马建忠并与之畅谈。此外，在马建忠、罗丰禄等人去世后，考狄为之撰写的悼词也见证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正是因为10余年与中国学团的深入接触，考狄比绝大多数的汉学家都更了解这个国家和民族，因此即便目睹了中国饱受内忧外患之扰的局面，他仍坚定地说道：“我对这个伟大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四千多年来，这个民族的历史从未间断，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中国在远东、在世界上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擅长汉学文献学研究。从1869年抵华到1881年回归法国，10余年与中国紧密关联的人生经历，让中国研究成为考狄学术事业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虽然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但考狄凭借自身深厚的文献学素养，在搜集和整理与中国相关的研究资料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其中以《西人论中国书目》最具代表性。《西人论中国书目》是西方汉学史上第一部相对完整的汉学书目，主要收录了从16世纪到1924年用欧洲语言写的所有汉学文献，其中有70000条涉及中国主题的分类目录。这部书目把西人研究中国各方面的著述和论文以及中国古代名著的译文分类列目，较全面地反映了早期西方对中国研究的状况，被赞为“分类得体，子目详细，为治东方学必备之书”。对此书的编

补工作贯穿考狄的一生，直到他去世当年仍在为之撰写索引。作为西方汉学目录学的奠基之作，《西人论中国书目》至今在海外汉学史的研究中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是许多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案头必备书目。

考狄的另一代表作《中国通史及其与西方关系》虽以史论的形式呈现，但因他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完全取自冯秉正的《中国通史》一书，而冯书是对《通鉴纲目》满文译本的法译，疏漏较多，这导致考狄此书作为一部中国通史的价值并不高。但若从文献资料的角度看则是另一番景象。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以中华文明起源为例，考狄首次将彼时盛行于西方学界各类中华文明溯源说悉数搜罗列出，在分析和比较中发现其各自的缺漏，从而判断“（西方研究者）对中国的前史研究还未真正展开”。从整体情况的呈现上，尤其是在关于中国与西方关系部分的写作中，考狄对比运用了大量的中国历史材料和与中英、中法关系相关的近代文献材料，其丰富和全面程度为前人所远不能及。因此，将《中国通史》及其与西方国家关系》视作一部史料汇编，或许更能发掘出其真正的价值。

法国汉学繁荣的幕后功臣。除个人研究外，考狄在汉学人才的发掘、引导和专业期刊创办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对法国汉学在20世纪上半期取得空前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在汉学研究材料、内容、方法等多方面的开创之功，沙畹被誉为“西方汉学第一人”。初涉汉学研究时，沙畹本欲从中国哲学开始其汉学道路并就此询问考狄，是后者结合学界当时的研究情况，提醒他理雅各在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已有相当的成就，劝说沙

畹“最好还是从事当时被忽视的历史研究，例如从二十四史中选择一部翻译出来并对其进行全面评论”，沙畹遂由《史记》译注入手逐渐开辟了西方汉学研究新局面。此外，伯希和、马伯乐等法国汉学大师都曾受到过考狄的教导，马伯乐更将考狄视为自己“远东研究的启蒙者和导师”。

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关注与日俱增，考狄有意创办一份专门发表远东地区研究的期刊来展现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1882年，他首作尝试，在勒鲁出版社创立发行了《远东杂志》。该杂志内容涉及汉籍译介、传教士书信以及各类专题研究，成为远东研究者成果展示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但终因资金短缺和汉字排版印刷的困难而停刊。然而考狄并未就此放弃这项志愿。以填补“远东民族研究中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为目的，1890年他联合莱顿大学教授施古德共同创办了专业汉学期刊《通报》，刊发有关中国及曾经的汉文化圈辐射国家的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研究。自创办以来，考狄先后与施古德、沙畹、伯希和合作担任《通报》主编，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将这份刊物逐渐打造成汉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时至今日，《通报》仍由荷兰布吕尔出版社定期发行，在各国中国学研究者间享有盛誉。无怪乎伯希和曾言“创立和维系《通报》，或许是考狄为东方学的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是加拿大著名国际和平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中国出生并生活工作了近30年，担任过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等职，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争取世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扩大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影响等方面作了不懈努力，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加中人民友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文幼章1898年在中国四川出生，先后在乐山、成都等地度过了童年时光，1910年跟随父母回加拿大读书。1925年，文幼章以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身份再次来华，他一边学习中文一边传教，非常重视了解中国国情和当地民情，对中国百姓的疾苦有了真切的了解。1926年发生的“万县惨案”让文幼章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身上感受到了勇气和活力，主张尊重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取消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

1931年，文幼章被派往私立重庆中学（1936年更名为精益中学）主管学校行政，兼任英语教师。1936年，文幼章创办了《精益中学英文周报》，在四川甚至远至北平等地都广受欢迎，发行量高达5000多份。由于该报常发表抨击法西斯的政治观点，德国和意大利领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把文幼章驱逐出境，并勒令停刊，而中国政府支持他继续办下去，周报一直坚持办到1939年。

1941年秋至1944年夏，在全面抗战爆发期间，文幼章曾回到加拿大开展了500多次演讲，讲述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事迹，呼吁加拿大政府和人民援助中国。他指出，华北地区的英勇游击队最能表现中国人民作战的努力。演讲中，他先后用中文和英文唱起《游击队歌》，让听众产生极大兴趣，这一系列的努力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引发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从国民党顾问转变为共产党战友。在私立重庆中学期间，文幼章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1932年，四川军阀刘湘请文幼章到重庆反省院“劝导”被关押的共产党人，企图以此动摇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出乎刘湘意料的是，经过与身处囹圄的共产党人的长期接触，文幼章非但没能感化他们，反而被他们的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深深触动，并成为他们的朋友。离开反省院后，在回答大儿子文少章提出的“共产党要在中国干什么”的问题时，文幼章说他们是打算帮助穷人的。这段宝贵的经历，也为他后来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转向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义事业埋下了伏笔。

之后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经历，让他逐渐对国民党感到失望。1939年3月，文幼章被聘请为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顾问，负责去生产部门、训练班和宣传机构视察，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军教官，任务是征集入伍新兵大会及军营里发表鼓舞抗战的演说。在此过程中，文幼章通过接触国民党各级官员，逐渐看清楚国民党两面派的真实面目，所谓关心民主和团结抗日的主张不过是骗局，国民党“缺乏社会责任感”，各级官员贪污横行。1940年，文幼章辞去“新生活运动”顾问一职，回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任英语教授。

在国家危亡和民族大义面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政策、信念、行动等方面的鲜明对比，使他更加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选择成为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作战的朋友。1944年10月，文幼章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兼职成员。1945年1月，文幼章在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参加中外记者招待会，会后周恩来请他进行了长谈。文幼章把自己的经历、思想，包括在战略情报局的兼职都坦诚相告。周恩来希望他能将共产党的主张和活动向美国报告，因为“我们想让美国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在周恩来安排下，文幼章从此能定期得到共产党方面的消息。1945年9月，在给战略情报局最后一个报告中，文幼章这样写道，“国民党政府过于腐败无能，不足以从事中国需要的工作”；共产党人“机智聪明，坚决果断”；“他们的纲领切实可行并符合广大贫困民众的需要”。

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抗战胜利后，文幼章积极投

文幼章：从国民党顾问转变为共产党战友

□ 吴耀明

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中。学生们名义上来文幼章家中补习英文，实际上是借外国教授住所的便利举行地下集会等革命活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来自延安的文章等秘密材料。1945年12月，在成都举行的声援昆明学生、抗议“一二·一”惨案的集会上，文幼章不顾个人安危上台发表演说、怒斥特务，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全力支持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统一的正义斗争。文幼章参加学生运动的行为，激怒了反动当局，国民党扬言要将他驱逐出境。

在这种情况下，文幼章原本准备返回加拿大，临行前收到了周恩来的一封信，请他前往南京相见。会面时，周恩来问文幼章是否愿意推迟回国时间，帮助做些宣传工作，希望他能在上海办一份英文刊物，让西方各界了解中国社会的真相。文幼章欣然接受委托，以圣约翰大学教授的身份为掩护，于1946年6月在上海编辑出版了《上海时事通讯》，向全世界揭示中国问题真相，呼吁西方政府不要支持国民党打内战。这份刊物在冲破新闻封锁、消除外国人士因媒体歪曲报道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以及反对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1975年，曾指导办刊的乔冠华对文幼章次子文忠志说：“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争取了许多新的外国朋友……在这场斗争中，文幼章是我们的战友。”

1947年文幼章回到加拿大后仍积极投身世界和平事业，不断为宣传中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奔走。1948年1月，他开始主办刊物《加拿大远东通讯》，并连续发行了40多年，客观报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7次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亲切接见，其中1952年访华期间赴中国东北实地调查，揭露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罪行。1983年最后一次访华时，他动情地说，我对中国革命帮助很小，而中国革命却把我由一个基督徒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人。1993年8月，文幼章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同年11月在加拿大逝世，次年家属按遗嘱将其部分骨灰撒入大渡河，实现回到第二故乡的夙愿。他的一生，同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是中国人民忠实和难忘的老朋友。

